

王有录 主编

《大学丛书》之一

中國通史

主 编 王 有 录

中 州 古 藉 出 版 社



王有录 主 编

中 国 通 史

第 四 卷(下)

主 编 刘宪章 陈崇钊 吴本祥

副主编 张关钊 周祖亮 牛福增

中 州 古 籍 出 版 社

第三编 概述

(1966年5月—1976年10月)

“文化大革命”时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的一个特殊时期。这十年大体上可分为三个阶段。

1966年5月至1969年4月为第一个阶段。这个阶段的中心内容是“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炮打所谓“刘少奇资产阶级司令部”。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全面夺权，进行“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所谓革命。由于指导思想、指导方针的错误和林彪、江青等人的破坏，造成“全面内战，打倒一切”的混乱局面。

1969年4月至1973年8月为第二阶段，这个阶段的中心内容，先是所谓“斗、批、改”和落实政策，后是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这个阶段的特点，是在所谓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内部，进行了复杂而尖锐的斗争，其中既有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也有反革命之间的争权夺利的斗争。

1973年9日至1976年10月为第三个阶段。这个阶段的特点是人民的空前觉醒，这个阶段的中心内容，是维护与否定“文化大革命”的斗争，最终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宣告延续十年之久的“文化大革命”结束。

“文化大革命”是一场由领导者错误地发动，被林

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

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负有主要责任，他在犯严重错误的时候，还始终认为自己的理论和实践是马克思主义的，是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所必需的。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他的错误是一个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所犯的错误，这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反革命破坏活动，在性质上根本不同，必须严格区别开来。

在“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同“左”倾错误，同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一直没有停止，使“文化大革命”的破坏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在这十年中，我国国民经济虽然遭到巨大的损失，但也取得了进展；在国家动乱的情况下，人民解放军仍然英勇保卫着祖国的安全；对外工作也打开了新局面。当然，这一切决不是“文化大革命”的成果，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我们的事业会取得更多的成就。

在“文化大革命”中，党和国家尽管遭到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破坏，但终于战胜了他们。历史一再表明，我们的人民是伟大的人民，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具有伟大而顽强的生命力。

“文化大革命”的历史还告诉我们，无产阶级在取得全国政权，特别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之后，必须把工作重点放在经济建设上，大力发展生产力，逐步改善人民的生活。对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的国内阶级状况和阶级斗争形势，必须作出符合客观实际的科学分析，采取正确的方

针和方法；必须正确地理解群众、阶级、政党和领袖之间的相互关系；必须进一步健全党的纪律和社会主义法制，使党内民主和社会主义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绝对不许有凌驾于党纪国法之上的特权。

第一章 “文化大革命”的发动

第一节 “文化大革命”的起因

1966年5月，毛泽东发动了席卷全国的“文化大革命”。“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内乱，是一场民族的灾难，历史的悲剧。“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决非偶然。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在1957年至1966年这十年期间，“毛泽东同志在关于社会主义社会阶级斗争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错误发展得越来越严重，他的个人专断作风逐步损害党的民主集中制，个人崇拜现象逐步发展。党中央未能及时纠正这些错误。林彪、江青、康生这些野心家又别有用心地利用和助长了这些错误。这就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这个结论，把“文化大革命”发生的历史原因，作了明确的全面的概括。

1、直接原因是毛泽东领导上的错误。就毛泽东的指导思想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他的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进一步发展的产物。这一点，首先是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错误判断开始的。由于在1957年反右斗争后，错误地改变了中共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从他提出：

“庐山出现的这场斗争，是一场阶级斗争，是过去十年社会主义革命过程中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两大对抗阶级的生死斗争的继续”起，到大讲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着社会主

义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就这样，在剥削阶级在我国已被消灭之后，重新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作为国内的主要矛盾，并使之不断扩大和升级、不断系统化和理论化，终于发展成为“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那样一种极端错误的“左”倾理论体系，并在这种错误理论指导下酿成一场大灾难。

这种“左”的错误观点的发展过程的每一步，中国共产党都接受了它，并且把作为毛泽东的新的理论创造，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反复进行宣传，使得影响很深，以致在以这些“左”倾思想为指导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就很难予以抵制了。

2、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受到严重削弱以至破坏，也是“文化大革命”能够发动并能持续十年之久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对此，邓小平曾有一段论述：“从1958年批评反冒进、1959年‘反右倾’以来，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逐渐不正常，一言堂、个人决定重大问题、个人崇拜、个人凌驾于组织之上一类家长制现象，不断滋长。”^①当党在面临着工作重心转向社会主义建设这一新任务因而需要特别谨慎的时候，毛泽东的威望也达到高峰。他逐渐骄傲起来，逐渐脱离实际和脱离群众，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这种现象是逐渐形成的，党中央对此也应负

^①《邓小平文选》，第290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第1版。

一定的责任。这个复杂现象是一定历史条件的产物。在共产主义运动中，领袖人物是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这是历史已经反复证明和不容置疑的。但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上由于没有正确解决领袖和党的关系问题而出现过的严重偏差，对中国共产党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中国是一个封建历史很长的国家，我们党对封建主义特别是对封建土地制度和豪绅恶霸进行了最坚决最彻底的斗争，在反封建斗争中养成了优良的民主传统；但是长期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仍然不是很容易肃清的，种种历史原因又使我们没有能把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这就提供了一种条件，使党的权力过分集中于个人，党内个人专断和个人崇拜现象滋长起来，也就使党和国家难于防止和制止“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发展。

3、林彪、江青、康生等利用和助长了毛泽东的错误，进行反革命活动，也是“文化大革命”发生和发展的重要原因。

在“文化大革命”之前，林彪、江青、康生等推波助澜，竭力迎合和发挥毛泽东的“左”倾观点。八届十一中全会以后，毛泽东把阶级斗争扩大化和绝对化，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康生、陈伯达等就把这种错误观点加以系统的发挥和阐述，并把它概括成为所谓“党的基本路线”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他们还蓄意制造个人崇拜，康生早在1958年曾吹捧“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除康生外，林彪又是一个现代造神家。1959年庐山会议上，林彪别有用心地攻击彭德怀，奉承毛泽东，说彭德怀是阴谋家、野心家、伪君子、冯玉

祥。说中央只有毛泽东是大英雄，谁也不要想当英雄，庐山会议后，林彪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又别有用心地编印“语录”，大搞个人崇拜，同时标榜自己是“高举”、“紧跟”的模范，从而既骗取了信任，又使毛泽东的“左”倾观点越来越成为对全党全国人民具有绝对权威的最高指示。

总之，‘文化大革命’的发生决非偶然，这是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指导思想上的“左”倾错误、党和国家若干制度中的弊病长期积累并逐步发展的结果。正象邓小平所分析的那样：“搞‘文化革命’，就毛主席本身的愿望来说，是出于避免资本主义复辟的考虑，但对中国本身实际情况作了错误的估计。”^①“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开始了全国性的大动乱。

第二节 “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

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五·一六通知》

1966年5月4日至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主持起草的作为“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即《五·一六通知》。

《五·一六通知》为发动“文化大革命”进行了舆论准备和组织准备。《通知》对党内和国内的形势作了违背实际的主观臆断、把我国社会主义现实描绘得一团漆黑，认为在学术界、教育界、文艺界、新闻界、出版界和报纸、广播、刊

^①《邓小平文选》，第305页。人民出版社1983年7月版。

物、书籍、教科书、讲演、文艺作品、电影、戏剧、曲艺、美术、音乐、舞蹈等各种艺术形式无一例外地都是资产阶级专了无产阶级的政，都是“黑线统治”，已面临资本主义复辟的现实危险。这种论断经过实践检验是错误的，是不符合当时历史实际的；由于《通知》对形势分析的错误，因而在政治上根本颠倒敌我关系，把所谓“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作为革命对象，要发动亿万群众开展大规模的全面的阶级斗争。毛泽东亲笔加到《通知》中的三段话具体体现了《通知》的基本精神、中心思想：

“中央和中央机关、各省、市、自治区，都有这样一批资产阶级代表人物。”

全党必须“高举无产阶级文化革命的大旗，彻底揭露那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所谓学术权威的资产阶级的反动立场，彻底批判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夺取在这些文化领域中的领导权。而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同时批判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文化领域的各界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职务”。

“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要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这些人物，有些已被我们识破了，有些则还没有被识破，有些正在受到我们的信用，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现在正睡在我们的身旁，各级党委必须充分注意这一点”。“我们对他们的斗争也只能是一场你死我活的斗争，我们对他们的关系绝对不是什么平等关系，而是一个阶级压迫另一个阶级的关系，即

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独裁或专政的关系。”这些从“左”的观点出发，混淆敌我，严重脱离实际的要求和估计，是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主要论点。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雏型。《通知》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的“左”倾纲领，《通知》的制定和通过标志着“左”倾指导方针已经在党内占据了统治地位。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一场史无前例的历史悲剧从此出台上演。

在林彪、江青、康生等人的诬陷下，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被打成“反党集团”。经过5月23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停止彭、罗、陆的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的职务，并撤销彭真的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撤销陆定一的中央宣教部部长的职务，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进一步审查他们的“反党活动和不正常关系”。这样，彭、罗、陆、杨就作为“反党集团”打倒了，为林彪、江青一伙篡党夺权和为开展“文化大革命”从组织上扫除障碍。

会议正式宣布撤销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及其办事机构，重新设立中央文化革命小组，这是为了开展“文化大革命”采取的组织措施，并让它掌握了中央的很大部分权力。5月28日中央文化革命小组成立，这个重新设立的文化革命小组以陈伯达为组长，康生为顾问，江青、张春桥等为副组长。这个小组逐步取代中央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实际指挥机构。8月底，由江青代理中央文化革命小组组长，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人在中央文革中形成江青反革命集团，它发号施令，主宰一切，成为极大的祸害。

根据《通知》的要求，5月底陈伯达率领工作组进驻

《人民日报》社夺了权。从1966年6月1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起，连续五天，每天发一篇社论，把《通知》的内容捅向全国，并大肆宣扬林彪的那套鼓吹现代迷信的黑货。6月2日刊登聂元梓等人的一张大字报，同时发表王力、关锋、曹轶欧等人炮制的《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一张大字报》，断言北大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顽固堡垒”，北大的党是“假共产党”、“修正主义的党”，号召群众起来打倒“黑帮”、“黑组织”。立即引起北京各学校，随后是全国各学校的极度混乱。6月4日，《人民日报》公布中共中央改组北京市委的决定，同时发表北京新市委改组北大党委的决定。北京市委和北大党委是被“文化大革命”第一个冲垮的党的地方基层组织。在其影响下，各地青年学生首先响应，起来“造反”。一批所谓“勇敢的闯将”，利用青年学生对党和毛泽东的热爱、对官僚主义作风的不满，利用他们的单纯和热情，带头组织了红卫兵，掀起了打倒“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批判“反动学术权威”、“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把斗争矛头指向各级党委的恶浪。

当时，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为了把正在发展的动乱限制在一定范围内，代表中共中央决定向北京市大学和中学派出工作组。6月4日，北京新市委派张承先率领的工作组到北大。18日，工作组及时制止了在极“左”思潮煽动下，“造反派”乱揪乱斗党政干部和专家教授的错误行动。刘少奇把北大工作组制止乱打乱斗事件的简报转发全国。此后，许多省、市也相继向大专院校（包括部分中学）派出工作组。而康生、江青等人，却诬蔑刘少奇是“镇压小将”、“对抗文化大革命”，煽动学

生赶走工作组。7月中旬，毛泽东从武汉回到北京。25日在接见中央局书记和中央文革小组成员时指出，工作组“起坏作用，阻碍运动”，要“统统驱逐之”。陈伯达、康生、江青乘机鼓动甩掉“保姆”、“踢开绊脚石，彻底闹革命”。从此，取消了党对大专院校“文化大革命”的具体领导，于是，这场内乱迅速地向全国各地铺开。

二、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

1966年8月1日至12日，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在北京召开。毛泽东主持了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除中央委员七十四人，候补中央委员六十七人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负责人外，还有中央文革小组成员、中央各有关部门负责人和首都高等院校师生代表等共四十七人列席了会议。

会议印发了8月1日毛泽东写的《给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红卫兵的信》。信中表示支持正在兴起的以青少年为主体的红卫兵运动。此后，红卫兵运动风起云涌，遍及全国。而红卫兵组织是完全脱离党和共青团各级组织领导的，红卫兵运动是造成全国大动乱的重要因素。

8月5日，毛泽东发表《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虽然没有点名，然而明显地批判刘少奇和邓小平，肯定了党内有一个所谓“资产阶级司令部”。这就把党中央内部关于如何搞“文化大革命”的分歧，以及1962年以来工作指导方针上的若干分歧，都说成两条路线、两个司令部的斗争。这张大字报作为全会文件于7日印发给到会人员，它标志着对党中央状况估计错误、阶级斗争“左”倾理论、个人专断作风的急剧发展。这张大字报使参加会

议的大多数人感到震惊，预料到即将发生一场新的灾难。

5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党中央宣布：中央批转的《北京大学文化革命简报》（第九号）是错误的，中央决定撤销这个文件。这就等于肯定了乱揪乱斗打人现象是正确的革命的行为。

8月8日，全会通过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十六条”）。提出了“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把领导权“夺回到无产阶级革命派手中”。“十六条”提出“要充分运用大字报，大辩论这些形式，进行大鸣大放……揭露一切牛鬼蛇神”，“让群众在运动中自己教育自己”，让“一大批本来不出名的革命青少年”去冲杀，因此他们“成了勇敢的闯将”，“他们的革命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十六条和《五一六通知》一样，是指导“文化大革命”的纲领性文件。

12日，全会同意毛泽东的意见，对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错误的改组。补选陶铸、陈伯达、康生、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为中央政治局委员。补选李雪峰、宋任穷、谢富治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选举毛泽东、林彪、周恩来、陶铸、陈伯达、邓小平、康生、刘少奇、朱德、李富春、陈云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委员。补选谢富治、刘宁一为中央书记处书记。全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未按得票多少排列名次，刘少奇的名次由原来的第二位降到第八位；林彪名列第二，成为毛泽东的接班人。全会没有选举副主席，实际上取消了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的副主席职务，林彪成为唯一的副主席。这次改组的实质，是取消努力坚持八大路线的中央第一线。

5月，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八届十一中全会的召开，

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这两个会议相继通过的《五·一六通知》和《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決定》以及所采取的一系列措施，使毛泽东的“左”倾错误的个人领导实际上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这些错误決定，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所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

第三节 全国大动乱

一、红卫兵运动的兴起

1966年5月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的几个学生，为了“大树特树毛泽东思想的绝对权威”，秘密地成立了红卫兵的组织。在他们的影响下，6月初，北京地质学院附属中学等五所中学的学生也相继成立了“红卫兵”、“红旗”、“东风”等秘密学生组织，这就是“文化大革命”初期在北京最早出现的红卫兵组织。

随着运动的发展，工作组与红卫兵发生正面冲突。工作组认为这种秘密的中学生组织是在进行非法的反革命活动，令其解散。清华附中的红卫兵在“造反有理”思想指导下，公开与工作组抗衡，先后三次贴出了《论无产阶级革命造反精神万岁！》的大字报，声称“已经把反造起来了，那么就一反到底。”

8月1日，毛泽东写信给清华大学附中红卫兵，认为他们的行动“说明对反动派造反有理”。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支持，并表示“不论在北京、在全国、在文化大革命运

动中，凡是同你们采取同样革命态度的人们，我们一律给予热烈的支持。”这实质是借助红卫兵、公开宣判刘少奇派工作组的死刑。从此，“造反有理”成了风靡一时的口号。红卫兵组织因得到毛泽东的支持，迅速向全国发展。

8月18日，毛泽东身穿军装，佩戴红卫兵袖章，以红卫兵总司令的身份，在天安门城楼检阅和接见了红卫兵，并再次表示对红卫兵坚决支持。在会上，林彪作了煽动性的讲话，也表示坚决支持红卫兵的“敢闯、敢干、敢革命、敢造反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鼓动红卫兵去“造反”，号召“打倒一切”。这次接见后，红卫兵运动更加迅猛发展，势如燎原，以极“左”的狂热姿态，登上“文化大革命”的政治舞台，成为全国大动乱的一个重要因素。

9月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组织外地革命师生来北京参加革命运动的通知》，从此，开始了全国性的“革命大串联”。到11月下旬，毛泽东先后在北京8次接见了1300多万红卫兵。红卫兵又从天安门走向全国各地去“串联”，各种交通工具里都挤满了免费乘坐的红卫兵，沿途城镇都设立了免费接待站。

红卫兵向四面出击，到处“炮打”“火烧”“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批斗、游街、体罚、抄家之风遍及全国。在所谓大破“四旧”中，全国各地名胜古迹、文物、档案，遭到了空前的破坏，历史文化遗产横遭洗劫。中外古典作品、名著、字画、古籍、也被付诸一炬。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遭到难以估计的损失。

这种违反马列主义基本原则和党的传统的“文化大革命”，从一开始就受到广大干部和群众采取的不同形式的抵制，使“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受到阻力。为了克服阻

力，1966年10月，毛泽东提出“彻底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周恩来不同意这一提法，他专门找了毛泽东表明自己的看法，毛泽东仍然坚持自己的意见。^①10月9日至28日，毛泽东主持的中央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陈伯达作题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的两条路线》的报告，大肆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林彪在会上讲话，指名攻击刘少奇、邓小平执行的是“一条压制群众、反对革命的路线”，并说，“这次文化大革命运动的错误路线主要是刘、邓发起的”。会后，全国掀起批判所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高潮。中央各部和地方各级党委受到冲击，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领导干部普遍被“靠边”，受到批判和斗争。除军队外，全国各地党组织都陷于瘫痪、半瘫痪状态。广大党员被停止了组织生活。党长期依靠的许多积极分子和基本群众受到排斥和打击。

二、“一月风暴”

发动全国性的“夺权”斗争，是“左”倾的错误发展的必然结果。1967年1月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经毛泽东审定的，题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宣布“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毛泽东认为“上海的形势大有希望，工人起来了，学生起来了，机关干部起来了，‘内外有别’的框框可以打破”。根据毛泽东的

^① 详见高文谦：《艰难而光辉的最后岁月》载《文献和研究》1986年第一期。《人民日报》1986年1月5日转载，《历史在这里沉思》一书收入。